

纪念改革开放30年“潮动中原”系列报道之十五

一种果树和一个产业链的形成

本报记者 赵国锋 文/图

核心提示

新郑市是全国著名的大枣产区,过去枣农守着摇钱树过穷日子。改革开放后,枣农把小小的红枣做成了大文章,形成了一个种植、加工、销售的产业链,6.8万户枣农因此走上致富路。

为充饥和治沙大量栽种枣树

再过一个月就是大枣成熟的季节。眼下,走进新郑市大枣产区,只见成片、成行的大枣树上挂满了一串串青青的小枣,一派丰收在望的景象,枣农们说:“如果没有大的自然灾害发生,今年大枣又是个丰收年。”

在新郑有这样一传说:5000年前的一个初秋时节,中华人文始祖轩辕黄帝带领大臣、卫士到野外打猎,为追赶一只麋鹿而迷了路,人困马乏,又饥又渴。当夕阳西下时,他们发现了一片果树,卫士摘了一些品尝后说:“味道不错!”大家纷纷采摘充饥,边吃边说:“仙果、仙果!”到底是什么果,谁也不知道名字,就请黄帝赐名。黄帝说:“此果解了我劳饥之困,一路找来不容易,就起名叫‘找’吧!”从此,此果叫“找”在民间传开。经过几千年的演变,人们把“找”叫成了“枣”。这个传说,证实了新郑是大枣的故乡。

1978年在新郑裴李岗文化遗址考古中竟然发现了枣核化石,印证了新郑是大枣的发源地,也证明了新郑红枣的栽培史已有8000多年。到春秋时的新郑曾有“桃枣荫于街”的情景记载。在旧社会,大枣除了入药,最重要的是穷苦人用来充饥,被老百姓称为“木本粮食”。

新中国成立后,在大炼钢铁年代,大批枣树被砍伐。到了学习焦裕禄的年代,新郑市位于黄河故道的8个乡镇,为治理沙丘,大力发展枣树,枣树得以恢复。因为,枣树根系疏广、枝叶稀少、耐干旱,能有效地防风固沙。

当时枣树归生产队集体所有,农民以农作物为主,也没有人去管理,随便生长。每年生产队采摘的大枣,全部当作二类物资由当地供销社和土产果品公司收购。上世纪60年代,收购的大枣由省供销社统一调拨到全国各地,群众收入寥寥无几。采摘时节如果遇到连阴雨,浆枣和霉枣只能喂猪。8个乡镇中,枣树面积最多的是孟庄镇。当时,新郑流传着“孟庄孟庄,到处沙丘,粮食不义,种枣喝汤。”的顺口溜。因为经商是资本主义行为,因为枣树是集体的,大家只好守着摇钱树过穷日子。

小枣做成了大产业

新郑大枣因生长在沙地,形成了皮薄、肉厚、核小、甜度高的优良品质。改革开放后,枣树分到家家户,枣农管理的积极性提高,大枣产量逐年增加。对收获的好大枣,枣农蹲在107国道两旁,或者骑自行车到郑州零售,劳心费神。对浆枣、霉枣、虫枣,有一些人想出了



古枣树

废物生财的办法,他们依靠科技提取这些残次枣中的香精,作为香烟调味剂,销售到新郑及各地烟厂,用于香烟生产。

这些零售者都是“小散户”,一些“大户”除了自家的大枣,还收购大枣运到外地销售,石聚彬就是其中之一。1986年,没有考上大学的石聚彬从报纸上看到两条信息,一是首先富起来的深圳人用大枣作滋补品煲汤;二是红枣加工制品在日本走俏。当年大枣下来时,他就收购了6吨大枣去深圳销售。由于运输时间过长,部分大枣发霉,他没有赚到钱。第二年,他再试牛刀,一下子赚了2万多元,摇身一变成了“万元户”,这在当时可是凤毛麟角。于是,乡亲们选举这个21岁的“能人”当了村委会主任。

1988年新郑大枣丰收,石聚彬将全村20多吨大枣运往深圳,因没事先了解市场,到深圳后才知市场饱和,到处是积压的大枣。加上阴雨连绵,大枣发霉的发霉、浆的浆,这一趟赔了5万元。他感到对不起乡亲们,辞去了村主任职务。他并没有因此消沉,经过大量调查研究,认为要想靠大枣让乡亲们富起来,必须搞大枣精深加工。1992年6月,他大胆承包了孟庄一家干果加工厂的一个车间,开始创作他的“大枣文章”。一年后,他创办的新郑市奥星食品厂“出炉”。随着他开发的第一个产品“去核枣”在广州市场站稳脚跟,一发不可收,相继研制出了12个系列、近200个品种。1997年他成立了奥星实业有限公司,目前总资产达2.27亿元,每年吞掉新郑大枣80%产量,枣农再也不用发愁卖枣的事了,同时为当地农民提供了1000多个就业岗位。

受奥星的带动,新郑不少人投资大枣深加工,目前从事大枣深加工企业有80多家,其中

百万元产值以上的企业有33家。他们把特级枣和一级枣进行包装,以品牌销售,将次枣和浆枣进行深加工。开发出了蜜枣、焦枣、枣茶、饮料、枣酒、枣醋、枣片、枣干、枣罐头等,全年加工大枣1200万公斤,出口到日本、韩国、新加坡、美国、加拿大等华人多的国家。

过去喂猪的浆枣、虫枣、霉枣,如今人们从中提取出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变成了一查查人民币。把小小的大枣做成了一个产业,这是新郑枣农前辈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

500人奔赴新疆租地种枣

去年以来,郑州人发现,满大街卖大枣的都打出了“新疆大枣”的招牌,这是为什么呢?据新郑市林业局有关同志说,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新疆人借鉴新郑人靠枣树治理风沙的经验,引进大量枣树苗栽种。因为新疆干旱、日照时间长,收获的大枣甜度超过了新郑大枣。

由于奥星等几个龙头企业生产规模越来越大,对原枣的需求量越来越多,新郑大枣价格节节攀升。10年间大枣价格由5元/斤攀升到现在20多元/斤,可土地面积不能增加,于是新郑人把目光瞄准了新疆,因为新疆地广人稀。三四年间,新郑人就开始到新疆喀什、阿克苏等地租赁土地栽种枣树。粗略估计,目前在新疆栽种枣树的人有500多,他们最少的租赁100亩,最多的租赁500多亩。虽然他们新栽种的枣树还没有结果,但他们在看护枣树的同时,当起了经纪人,每年新郑有5000万元资金进疆收购大枣,运回新郑和郑州销售,吃差价。据了解,由于新郑人的收购,新疆大枣价格比几年前

翻了一倍多。在大枣还没有完全成熟时,新郑人就订购了树上的大枣,竞争十分激烈。

与此同时,新郑枣农也在积极栽种枣树,能栽种的地方都栽种上了枣树,全市枣农有6.8万户。家家户以大枣为生的孟庄镇寺东村孙超峰除留下4亩地种粮食吃,其余全部栽种上了枣树,他家院子和房前屋后都是枣树,一家3口人有90多棵枣树,去年除掉农药、化肥投资,纯收入1.2万元。孟庄镇还有几个种枣大户,每年收入在几万元。

成为全国枣树苗集散地

因为新疆干旱,在那里栽种枣树成活率很低,新疆每年需要大量的枣树苗,前往新疆的新郑枣农将新疆大枣运回来,接着将新郑枣树苗运入疆。于是,新郑市枣树苗培育专业户应运而生,全市现有枣树苗1000多亩,其中100亩以上的有5户,每年出苗600万棵,苗木已卖到1.5~3元/棵,仅此一项,新郑人每年收入达1000多万元。据新郑市林业局有关同志说,每年新郑调入新疆的枣树苗有500万棵。同时,新郑形成了枣树苗集散地,河北省、山东省及河南各地的枣树苗,最近几年都集中到新郑销售,外来的苗木达200万棵。

现在新郑市大枣面积已经发展到21万亩,品种达30多个,年产量突破3500万公斤,仅大枣每年给新郑市带来收入3亿元。

形成全国最大的大枣销售基地

“曾经在新疆举办的全国枣类评比中,新郑枣品质名列枣类第一名,新郑大枣的竞争优势和品牌价值提升了其在全国市场的竞争力。”郑州市林业局产业办公室主任姚新爱介绍说。

新郑的大枣招牌吸引河北、山东、内蒙古、陕西、山西、甘肃、新疆及河南各地的大枣纷纷到新郑销售,每年外地到新郑销售的干枣达1000万公斤,鲜枣达1000万公斤。其中,新疆、甘肃和陕西的大枣是从新郑引进的苗木,没想到多年后结的果实又来新郑销售。为此,新郑市投资建设了中华红枣商贸城,满足大枣交易需求。

在销售大军中,关键的队伍是新郑枣区常年以大枣为生的800多个大枣经纪人,他们在全国各大城市及对外口岸建立的代销代办点有1000多个,汇集新郑大枣的70%以上通过他们销往外地。

每年大枣销售旺季,新郑有300多个购销点,规模较大的在孟庄镇,集会每隔一天一次,日销售量8~10

万公斤。就是在3~9月份的销售淡季,购销网点也有100多个。他们将收购的原枣卖给客商,或者挑选分级,根据市场需要卖给加工企业,或包装后直接外销,通过加工或包装,一个小小的包装使大枣身价大增,通过这样的方式每年销全国各地的大枣达400万公斤。

还有人把大枣运往广州、天津、深圳外贸口岸,由当地经营土特产进出口贸易的公司出口,每年出口量在180万公斤左右。凡是华人的国家,特别认可大枣的营养价值。

由于新郑大枣市场的火爆,在新郑甚至出现了外地大枣冒充新郑大枣的情况,但新郑人对枣的外形、颜色、品质一看就分出真假。

大枣文化催生枣乡风情游

在新郑枣产区,大人、小孩都能讲述一些与大枣有关的趣事,听他们娓娓道来,简直是一种浓厚文化的享受。

裴李岗发现了8000多年前的枣核,黄帝为大枣命名,周朝时期开始以大枣作订婚信物,子产与枣、高拱与枣,还有《诗经》和《齐民要术》中的记载,新郑出土铜镜上铸刻的“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礼泉饥食枣”和白居易、高启留下的诗句……

1998年,新郑人想到了成年累月生活在城市的人向往田园生活,推出了集观赏性、娱乐性、参与性、知识性为一体的中华枣乡风情游,为久居闹市的都市人提供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旅游场所,让城市人漫步万亩枣林、领略枣乡风情、摘大枣、拔花生、吃农家饭、逛农家院。

通过旅游,不仅使生长在城市的孩子们了解了更多知识,也使枣农获得了更多的收益。据了解,每年枣乡风情游,使枣树在路边的枣农收入增加1000元以上。几年来,每年枣乡风情游给新郑市带去收入近2亿元。

新郑市委书记赵武安说:“我们要以大枣为媒,旅游搭台,经贸唱戏,狠抓招商引资,把大枣产业做精、做细、做大!”“八月十五到,遍地红玛瑙”,他热烈欢迎郑州市民在金秋时节到新郑旅游。



大枣加工车间

新闻时评

编辑 陈培营 杨怀锁 电话 67655277 E-mail: cpyy@163.com

迎奥运与平常心

亲友、邻里间自发形成的合乘出行,得到北京市交管局的肯定。北京市交管部门还倡议北京私家车主与亲朋同行,并在遵守单双号出行的基础上,每周少开一天车。对那些喜欢拼车的车主来说,这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它既符合节能环保的理念,也切合市民实际生活的需要,而就在同一天,由于进京车辆检查环节协调问题,一些进京路口出现拥堵。(7月16日《新京报》报道)

奥运近在眼前,正在测试我们的城市管理水平,如果管理者务实而符合人性的需要,就会得到市民的支持拥护,而工作缺乏充分调研,可能会出现困难与问题。一些进京车辆因检查出现拥堵,是因为检查部门没有充分估计车流量,造成被动。而在提倡市民拼车出行这一方式上,有关部门的倡导却体现了主动性与务实性。

奥运的交通管制在过去几届奥运会时已成惯例。2004年的希腊奥运会,希腊政府在连接奥运村、各比赛场馆、主新闻中心和国际广播中心的主干道上,开辟了160多公里长的专用车道,禁止社会车辆通行。更为严厉的是,雅典将闹市区的停车收费提高到每小时8欧元,办一个奥运会场馆的停车证则需要2500欧元,违章停车通常被罚65欧元,而且20天之内不许开车。而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期间,西班牙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1988年,汉城奥运会开幕前一个月和举办之时,韩国首都分别实行“十日制”和“五日制”的机动车出行办法。

奥运期间的交通管制体现了举办城市对奥运的尊重,而举办城市市民则在为奥运的成功举办而作出牺牲。作为城市管理者,市民的感受要成为重要的决策考虑。现在我们在城市形象上花了很大的工夫,譬如许多街道统一了广告招牌的模板,一些临街楼房粉饰一新,路面与人行道也重新铺设砖块,可谓无微不至,但如果一些措施在执行过程中出现“过度”,如有的城市管理者不体谅环卫工人日晒雨淋的毛巾晾到户外,有的不允许店主将自行车放在门外,这里我们看到的是某些管理人员的一种焦虑,迎接奥运还缺乏一颗平常心。

其实,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自己去参观其他国家举办的奥运会,我们会在乎他们的衣服晾晒在户外吗?我们会对他们门口的自行车有意见吗?生活就是锅碗瓢盆杂什大交响,这也是生活的魅力,如果对秩序过于苛责,生活在城市的人们还有参观者都会觉得不真实,而这会直接影响到市民的心情,这种失去平常心的情绪,又会影响到他们奥运期间的待人接物。所以城市管理者们的人性化管理显得非常重要。

古人说过“治大国若烹小鲜”,管理城市、办奥运大事,也应该像烹制小鱼那样,各种措施要尽量合乎民意、顺其自然,所有的人都用平常心对待奥运,我们人文奥运的目的就达到了。 吴祚来

不必梦回清朝

西湖要变样了。变更西湖模样有个主导原则,就是以《清乾隆西湖行宫图卷》为参照,曲院风荷、花港观鱼、三潭印月、柳浪闻莺、南屏晚钟、雷峰夕照、双峰插云等景点都将进行不同程度的修缮和改动。(7月16日《东方早报》)

景观的形成有历史、经济、社会、人文思想等诸种因素,可以说,哪朝哪代的西湖景观都互有差异,也与今日的不同。这次西湖修缮的原则,意在复古,以清朝行宫图为蓝本,给人的感觉,是要梦回清朝。为什么要梦回清朝,而不是回到明朝、元朝、宋朝,或其他朝代,从新闻报道上看,主导整治工作的人并未有任何说明。是梦回明朝、元朝、宋朝的难度太大,

没有什么依据?还是就觉得清朝的西湖是景致之最?这些都是问号。

难以梦回明朝、元朝、宋朝,西湖梦回清朝,也只能是一厢情愿。西湖景观,既是自然景观,也是人文景观。它在当下所具有的完整性里,留有各个时期的印迹。拿清朝的时空感来换几百年后今天的时空感,让人生出的感觉是:不知今夕是何年。有专家说,每一个景观背后,代表着空间和景色之间的互动,通过对空间的调整,正是为了增加清华的“人文气息”,同时希望清华能更包容,允许学生有个性,有创造力,这样才能真正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京华时报》7月17日)

以裸奔的形式庆祝毕业?真是够吸引人眼球的。行为的另类,注定要引起舆论的争议。在转载这则新闻的互联网各大门户网站上,笔者发现,网友们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少数人认为,这种行为属于人的自由之一种,彰显了人的个性,清华大学应该对此加以包容;但更多的人则表示,个性需要适度,过度张扬个性就沦为无耻,涉嫌炒作。在我看来,这两种“观点”其实都有些偏颇。裸体确乎是人的自由,但这要分场合,私人空间内的裸奔可以随意为之,但公共场所的裸奔就涉及公共秩序,要受法律“规范”,这压根就不是一个包容不包容的问题;至于说毕业裸奔纯属无耻,也言过其实,过于上纲上线了。

切入现实,我们不难发现,在类似的“裸奔事件”背后,都会有如此针对麦芒的“争议”出现——围绕道德还是非道德的基点进行辩论,实际上一起陷入了唯道德主义评判的窠臼而不自知。

在现代文明的视野下,一个社会的价值体系定然是开放而多元的,由此,各种另类的、对立于主流社会价值的价值观就有了张扬的机会——譬如时下沸沸扬扬的“范美忠先跑论”,再譬如这种庆毕业裸奔的价值选择。如何看待如此“非主流”的、有悖于传统道德的另类价值观

视觉感受,改变几代人对西湖的记忆。

梦回清朝,错在造假,罪在造假。给平湖秋月加上围墙,花港观鱼恢复临水长廊,直接的结果是造出一批不伦不类的假古董。视觉里的假古董,就是再像清代,也是低俗的赝品。它与西湖的历史无关,也与游人的感官盛宴无关。在西湖风景里堆积的假古董越多,整个景观的灾难性就越大。

人们对西湖的印象,不仅来源于视觉,还来源于历史回忆及个人经验。西湖是“山色有无中”,古今难画亦难诗”的色调,它的韵味在于“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在每个见到它的人的心理上,精神上构建了相互关联的形象,是属于人们共享的财富。不必梦回清朝,即意味着有保护它权力的人不要乱拍脑袋,去破坏其天生丽质。这种天生丽质一旦遭到破坏,恢复起来,就不是难度的问题了。 今语

个性与公共性的博弈不需道德裁判

呢?可以不认同或者支持,但却不能粗暴地进行“封锁”,也不能动不动就抡起道德大棒加以“围攻”。

我以为,个性与道德——究竟是个性需尊重道德,还是道德要宽容个性,很难有一个“盖棺定论”。但如果我们换个角度,在个性与公共性之间进行“考量”,就不难得出结论。就事论事,毕业裸奔在学校的公共场所为之,已经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四条之规定:“在公共场所故意裸露身体,情节恶劣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既然如此,我们何必又要进行喋喋不休的道德争论呢?不违法的裸奔再另类也有存在的权利,但侵犯法律制度、破坏公共秩序的个性就永无提倡的可能——我们要学会不再用道德去对“个性与公共性的博弈”进行裁判。 陈一舟

房价让谁给忽悠“瘸”了

7月16日,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月度指数报告对70个大中城市的房价涨跌情况给出了说法,6月份70个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8.2%;而环比价格与上月持平。(《中国青年报》7月17日)

大概因为学者打赌的缘故吧,大家的注意力过多地集中在深圳那边了,于是很多人错误地把深圳房价的下跌当成全国的趋势。公众或网友中的绝大多数人并不具备专业分析能力,得出错误判断也是难免。但是前几日出席“无锡2008中国房地产高峰论坛”的冯仑、潘石屹及某些经济学家们大声疾呼地产市场到了救市的关口,不能不让人怀疑所谓“猪坚强”之说实际上是“心里揣着明白”。这一次我觉得任志强说了一点实话:“今年1到5月份,全国的房地产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去年是高速增长,今年只是略有下降,但销售量依旧坚挺;个别楼盘和个别城市并不能代表整体市场。”令人“感动”的是,某些经济学家比任志强还要悲观、还要着急:“我们已经从信贷真空造成的观望演变成了因为信心真空所造成的观望,这样的观望可怕得多”,“再这样下去房市会成为中国的第二个股市,进入另一种非理性”……还有业内权威人士讲出更加悲观的预测:如果开发商资金紧张,土地交易将难以进行,土地收入下滑,将会影响到保障性住房的建设……

地产商、经济学家、业内权威人士的轮番“要挟”或“逼宫”,据说见到一些效果,媒体上甚至传出了“楼市政策或见松动”的消息。

然而,究竟是否已经到了救市的关口,“猪坚强”到底瘦了多少斤,终究不能轻信利益集团或帮腔者的一唱一和,而是要拿数据和事实说话。社科院研究员易宪容和国务院参事任玉岭拿出的数据显示,1-5月份,全国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9519亿元,同比增长31.9%,高于同期4个百分点。也就是说,房地产开发增长不仅没有随着从紧货币政策下降,反之仍然处于高位运行;1-5月份,全国房屋施工面积也增长了24.9%。而国家发改委和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更加验证了房价总体趋势继续高走的事实。

原来,我们又被人给忽悠了;借用地产商的自喻,原来这头“猪”不但没瘦,而且又长肥了8.2%;所谓“瘦了200斤”,原来是他们只露一条“小腿”给我们看,这条“小腿”确实刚刚瘦了一点点,但并未影响到“全身”的肥壮。这种情形或许真的应了冯仑那句话——“这个腿是有点拐”。冯仑还说,目前楼市出现的“拐”是真的肌肉萎缩了还是被类似“赵本山”的经济学家忽悠“拐”的有待辨别。要我看,地产商的“腿拐”绝不能赖“赵本山”,而是他们自己忽悠“拐”的。再说得明白点,是他们自己装“拐”忽悠大家。 马涤明